

导 论

## 疾病与历史

历史学家与医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承认人类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人，也都特别关注生存条件对人的影响。编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要研究历史学家和医生不可避免地共同面临的一个领域，即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在医学诊断中，引起疾病的原因常常是单一的，而在探讨历史时，原因就可能是复杂的。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首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但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段，尤其是在其重要性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时候。

我们从曾给世界带来苦难的众多疾患中选出一些案例进行研究，目的就是要说明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因此，这一研究与历史有关，不管历史是被当作伟大人物的史诗，还是被当作有关社会条件和人类整体发展的故事。那些危害文明人的病痛与对它的预防、治疗一样，都是文明的

组成部分。假如疾病本身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那么征服疾病的重要性也不会低。诚如我们所见，尽管这种征服只是部分的征服，其本身也会带来不小的让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与我们研究的专题有关。

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有关原始人在洞穴中独居的描述是在误导人。家庭单位逐渐发展成为过着共同生活的部落。藤蔓纠葛、杳无人迹的森林使得交往很不方便，这些小规模部落坐落在人工廓清的空地上，而且各住地之间极少甚或没有联系。至今在遥远的丛林地区还存在着少数几个这样的部落。每个部落都自给自足，依赖天然生成的食物资源生活。例如，在中非，香蕉和木薯是他们的主食，间或吃少量的棕榈油，人们很少有肉吃，无论是人肉还是动物的肉。这些部落社区的敌人有蛇、食肉动物以及善用毒箭的矮人。生育时的产褥热、婴儿的高死亡率以及像昏睡病和雅司病（yaws，由感染雅司螺旋体而得的一种病，皮肤损害像梅毒，主要流行于热带地区——译者注）这样的流行病，也使得人口不能快速增长。人的寿命不长，部分原因是已有的病症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部分原因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饮食使得脂肪渗入主要器官而过早肥胖。因而，部落的增长几乎是静态的，在有利健康的季节出生数目超过死亡数目时，人口就增加，在死亡率高时，人口就减少。这就是原始部落缓慢增长的自然过程，食物足以果腹，并能抵御大的灾难，但不能对付生育和疾病的风险。

饥荒、战争或是疫病这样的灾难只是从外部来打击土著居民。蝗虫落在谷物上会造成饥荒；来自北非和东非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会突然攻击某个村子，把人带走当奴隶。后来，白人带来了对他自己无害、但对先天或后天缺乏抵抗力的土著居民却是致命的新疾病。

数千年前，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民族开始从这些自给自足的社区中产生出来，但遭遇大灾难的机会也随之成倍增

加。较高程度的文明使人们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和较全面、丰富的精神生活，但也带来了灾难。当更多的人从中心地区迁往开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时，与陌生疾病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小径变成了道路，旅行更方便、快捷，新的疾病也会通过这样的道路传播开来，侵袭没有相应抵抗力的居民。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由于城市居民必须依靠外来的食品供应，在食品供应不上时，饥荒就无法避免，因为没有天然资源可以取而代之。饥饿、扩充生存空间或仅仅是某一酋长对权力的要求，都会使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开战，因此人类有三个规模不断扩张的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启示录》中的三骑士，在他的灰马上有死亡（此处用典可参阅《圣经·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的有关内容：“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上面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踢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译者注）。

瘟疫、饥荒和战争相互作用，造成了一连串后果。战争使得农民离开土地并毁了其谷物；谷物被毁造成饥荒；挨饿体弱的人们又很容易成为瘟疫的牺牲品。这三种都是疾病：瘟疫是人体的失调；饥荒是作物和牲畜的失调——或是恶劣天气导致的恶果，或是更直接的病虫害侵袭所致；而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大众精神的失调，是对公认行为的一种背离。在下面的几章中，有关饥荒和战争的疾病肯定有所提及，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还是那些直接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身体疾患。



## 第一章

# 古代世界的疾病

与文明有关的疾病的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因为这种文明在保存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已经存在。有关疾病及其某时产生严重后果的记录在人类发展的相当早的阶段就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医学教科书——中国的《神农本草》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3000 年，在韦尔科姆历史博物馆有一枚巴比伦的医生印章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在埃伯斯纸草书中提到过流行热病，这一纸草书是 1862 年格奥尔格·埃伯斯在底比斯的一座墓穴中发现的。纸草书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 1500 年，但大部分内容可能是更古老文献的抄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据记载有一种疫病在公元前 1500 年肆虐埃及，杀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头生子，从在位法老的头生子到地牢中囚徒的头生子，以及所有的头生牲畜。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例子，是上帝为劝法老允诺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身上的最后一个可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 40 年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战争一瘟疫的序列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载。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丁人开战，被打败。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丁人开战，但又遭受失败。腓力斯丁人俘虏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爆发了疫病。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伦，这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七个月的苦难后，腓力斯丁人得出结论，他们惟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被送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示麦人观看了约柜，因此遭到了一次大瘟疫的惩罚。疫病似乎传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约五万人。

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鼎盛时期。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和萨拉米斯的伟大海战中，这个希腊小国打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462年。在他统治时，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着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一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间的内部斗争。斯巴达是有优秀陆军但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军但陆军较弱的海上强国。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是攻不破的，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的供应，她就可以既不用在陆上交战，又不会因挨饿而屈服。在陆地上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她就能不费多大力气打败斯巴达。在战争的第一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她在陆上的防御政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墙里，受到包围。

灾难在公元前430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传到埃及，再由船经过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



公元前 430 年的雅典瘟疫，弗兰芒（荷兰）画家迈克尔·斯威茨（1624—1664）作。画面采用了常见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

虐了很短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  $1/3$  的人口死亡，或许是  $2/3$ 。更可怕的是灾难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崩溃，在疾疫大流行时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修昔底德描述了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对神，他们认为敬不敬神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对于人为的法律，没有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时。”修昔底德还提到，即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

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攻占斯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军刚扬帆时——准确地说是刚划桨时——瘟疫就在船上流行开来，来势之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雅典。在伯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皮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

“瘟疫不仅夺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他被认为在公元前 429 年死于疫病。

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症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包括富人和穷人。医生们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大批因此而死。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是的疾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种已消失了很长时间的疾病。但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人口聚居中心。因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一疫症也就特别有爆炸性。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幸存下来的人已逐渐增强了抵抗力，所以这一疾病也就不再那么致命。

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这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能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 27 年，到公元前 404 年以雅典战败告终。雅典的海军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马帝国的覆灭。对帝国覆灭的原因，历史学家过去争论了许多年。我们在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

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 300 年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 19 世纪中期才再次发展到这一水平。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

(Cloaca Maxima) 在公元前 6 世纪开始动工，发挥着现代下水道的的作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 79 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掉的庞培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各喷水柜的完善供水工程系统。约在公元 70 年韦伯芎皇帝统治时，在罗马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人们进去要付一点钱。与之相比，伦敦直到 1851 年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年，在贝德福德街为女士、在舰队街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收费为“如厕”(lavatory privileges) 2 便士，一条热毛巾 4 便士。建造费用化了 680 镑。尽管这些厕所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但在 5 个月内上厕所的收费就有 2470 镑。

清洁依靠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 312 年就有了第一条将洁净水送进城中的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六条水道，到 100 年后有十条水道每天供应 2.5 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其中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 200 万居民每人 50 加仑。这一数量是今天伦敦或纽约一个市民的用水量。1954 年，这些水道中的四条得到维修，被用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 200 年起就可一次供 1600 名浴客使用。80 年后戴克里先时建的浴场房间超过 3000 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伴随着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播，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登今天仍以疗养温泉享有盛名。

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和房屋肮脏的城区。其中几乎有 2/3 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比 1666 年大火后的伦敦幸运的是，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一座有着笔直、宽敞的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政官监督公共道路的清洁工作，他们还负责控制食物供应，制订条规以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和优质。其他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这

就使罗马人普遍采用更卫生的火葬制。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火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与中世纪的巴黎或 18 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水方面，罗马与 20 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大规模在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大量的人不能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个公元 1 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容忍一个 17 世纪的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看来是洁净的水，假如恰巧来自一个被污染的水源，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漫长的遭受瘟疫肆虐的衰败年代，这种缺乏基本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有关卫生的措施全然无效。

可以把罗马想像为坐在网中央的一只臃肿的蜘蛛。在罗马扩张的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又从东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濒临海洋，南面和东面邻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着不太开化的民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战略要地的驻军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军团修筑的笔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马。

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其中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军队也遭到那里居民的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而特地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着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的防治传染病的手段。假如相关的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一个

世纪的历史成为一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在公元前 1 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似乎在罗马附近的低湿地区流行，并在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造成大流行。传染范围好像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整个地区都被抛荒，成为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直到 19 世纪末情况才有所改观。

虽然同样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疟疾，一度在整个被征服地区出生率不断上升时，意大利—罗马人成活胎儿的比率却在急剧下降。而且，因难以治疗的疟疾引起了人们身体长时间患病和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使得国力衰退。到 4 世纪，有强大战斗力的军团不再由意大利人组成，不单是士兵，连军官也来自日耳曼部落。可能是疟疾而不是传说的从东方进口的堕落奢侈品，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

疟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个危险却来自遥远的东方。公元 1 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们压迫居住在欧亚大陆中部的阿兰人的日耳曼部落、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发动了一场不留情的西迁运动，最终覆灭了罗马，将帝国分解为一批相互征战的国家。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种他们不知道的欧洲疾病。451—452 年间，在阿提拉率领下，他们向西远达高卢和北意大利，但在入侵罗马城前就退了回来，其原因显然是遇到了传染疾病而不是防御战事。

安东尼疫病，有时又称盖伦医生疫病，164 年初次在共治的皇帝卢西乌斯·维鲁斯驻扎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两年中，这一疾病局限于东方，给阿维狄乌斯·克劳狄指挥的一支军队

造成极大破坏，这支军队是被派去镇压叙利亚的一次叛乱的。这种传染病随着这支军团传回来，传遍了乡村，166年传到罗马。很快它又波及到已知世界的各个部分，使得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以致从罗马和其他城市中不断运出一车车尸体。

这次天灾很著名，因为它使罗马的防御线出现了最早的裂缝。罗马帝国直到161年一直在继续扩张并确保其边境。在那一年，一支日耳曼游牧部落进攻意大利东北部屏障。畏惧以及涣散使得罗马军队在八年内都没有反击。169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被派出去对付入侵者。入侵者被打退，但看来是军团带来的疾病起了作用，因为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耳曼人未被发现身上有伤。瘟疫一直蔓延到180年，最后一批受害者中有一人是高贵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绝看儿子以免儿子也得病。这一瘟疫在短时间的缓解后，189年再次发作。这场病的第二次流行范围没有那么广，但对罗马城影响更烈，在高峰时一天就死了两千多人。

医生盖伦的名字与164—189年瘟疫相连不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瘟疫，还因为他留下了对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地方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并且使人的皮肤化脓，这就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病是天花流行的最早记录。

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恶性的天花疫病出现在蒙古，这种病迫使匈奴人西迁，传给日耳曼部落，再传染给罗马人。但与这一观点不合的是，后来罗马人发病的后期症状与16到19世纪欧洲人得天花的后期症状毫无相似之处。但正如我们要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看到的，一种疾病第一次出现的形式和过程常与人们熟知的这种病大为

不同。

从189年起直至250年前,没有再发生任何一种严重的“瘟疫”。到250年出现了无疑改变了西欧历史进程的西普里安大瘟疫。不过这种传染病的病因不明。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描述了其症状: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另一种描述说,这种病很快就发遍全身,并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没有人提到出皮疹,除非从“迅速传遍全身”这样的字句中推测其有明显的体征。与雅典的瘟疫一样,其起源地据说也来自埃塞俄比亚,从那里经过被当作罗马粮仓的埃及和罗马在北非的殖民地传来。在这方面,西普里安瘟疫颇像125年的奥罗西乌斯瘟疫,后者是饥荒一瘟疫接踵而来的一个例证,在其之前先爆发了一场毁了北非谷地的蝗灾。西普里安提到,手脚坏疽让人想到可能是因为麦角中毒病。麦角中毒流行是由吃了被麦角真菌感染的黑麦做成的面包引起的,这肯定会经常发生,但很少有材料表明,黑麦这种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谷物在罗马被大量地用来做面包。西普里安瘟疫传播范围很广且延续时间长,也使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保险一点的做法,是让这种病的病因存疑。

西普里安瘟疫很像1918—1919年间大流行的“西班牙感冒”;也就是说它影响了已知西方世界的各个地区。它迅速蔓延,不仅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还靠病人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传播。先是出现一场灾难,继之缓和下来,然后又来了一场同样猛烈的疫病。其传播有季节上的变化,秋季开始爆发,延续整个冬天和春天,到夏季热天来临时渐渐退去:这一往复变化表明这种病是斑疹伤寒。据说死亡率超过以前有记载的任何瘟疫,被传染的死者数目超过得病幸存的人。西普里安瘟疫的猖獗阶段延续了16年,在此期间引起了极大恐慌。成千上万人逃离农村涌入城市,这又导致瘟疫再次爆发,大批农田被废弃;有些人甚至认为连人类都有可能无法生存

下来。尽管在东部边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卢有战事，罗马帝国仍然克服了这场灾难，但到 275 年罗马军团被迫从特兰西瓦尼亚和黑森山撤退到多瑙河和莱茵河。形势看来是这样危险，以致奥雷连皇帝决定加强罗马城自身的防守。

很有可能，这种传染病在猖獗阶段过后还一直存在，但不是那么严重。在以后的 300 年间，当罗马在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压力下逐渐崩溃时，一种类似的瘟疫一再出现。在黑暗降临罗马以及强大的罗马帝国解体时，疾病的迹象渐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变为总是在讲述战争、饥荒和疾病。日耳曼民族涌入意大利和高卢，并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甚至还进入了北非。在北非，480 年的一场瘟疫削弱了汪达尔人，使他们无法抗击后来摩尔人发动的一次入侵。有传言说，467 年在罗马以及 455 年在维也纳附近都死了很多人。

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 444 年在英国的一次天灾，这显然是某次瘟疫大流行的一部分，对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历史有很大影响。按照比德的记述，英国死亡人数之多，使得没有足够的健康人来掩埋死者。这场瘟疫使罗马裔不列颠酋长沃蒂根的军队受到严重削弱，使得他不能对付蛮族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入侵。传说在与手下的酋长们商量之后，沃蒂根决定向 449 年到达的萨克森人寻求帮助，在他们的首领亨吉斯特和霍萨指挥下用他们当雇佣军。可能确实有一场传染病削弱了不列颠人，使得萨克森人得以成功进入。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出现在东方。公元前 1 世纪小亚细亚被并入罗马。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东都。联为一体的东部和西部帝国维持了约 150 年。然后，西罗马帝国解体，但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 1204 年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拉丁军队推翻。在 6 世纪期间，查士丁尼这位或许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几乎就要成功地将

恢复罗马、合并旧日帝国两部分的理想变成现实。532年，他对西方发动了一次进攻。查士丁尼夺回了迦太基和大部分的北非沿海地区，重新攻占了西西里并渡海进入意大利本土。那不勒斯落入他的将军贝利撒留手中，帝国军队还攻占了不设防的罗马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540年，日耳曼人的抵抗看来已被粉碎。在征服了部分西班牙后，查士丁尼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去征服高卢甚至去征服不列颠。

他的胜利没有延续下去。摩尔人把拜占庭人赶出了他们新获得的大部分非洲沿海地区。541年，年轻杰出的哥特人首领托提拉重新攻占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托提拉愿意与查士丁尼媾和，但拜占庭皇帝却决心重新征服所有地区。艰苦的战事又延续了11年，罗马被围攻了五次。在其中一次围城战中，哥特人为迫使对方投降，切断了水道。中世纪肮脏和邋遢的生活习俗部分地与这次行动有关，因为有着壮丽建筑和历史声望的罗马从来也没有完全失去它对欧洲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假如罗马依然发挥这一作用，大量供应洁净水，其他欧洲城市也会以它为榜样。

查士丁尼统治时应该是帝国的辉煌时期。他用一连串设防的城堡和碉楼环绕在属地四周，还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他的法典收录了古代罗马的法典，构成了以后许多世纪中欧洲法制的基础。他还征召了由名将贝利撒留和纳西斯指挥、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然而在他的长期统治时期，匈奴人几乎攻下他的首都，斯拉夫人攻占了阿德里安堡，波斯人洗劫了安条克。他的统治开始时处于极度的荣耀之中，之后慢慢衰败了。当查士丁尼83岁去世时，他留下一个比他527年登基时要贫困衰落得多的帝国。540年，就在他获得最大成功的那一年，一个比哥特人或汪达尔人更加可怕的敌人来到他身边

查士丁尼瘟疫是曾袭击过世人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从查士丁

尼统治时的书吏或档案官普罗科匹阿斯所写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些它的情况。最早被记录的病例出现在下埃及的佩卢西乌姆，瘟疫从那里传遍埃及，还传到巴勒斯坦，显然再从这里传到已知世界的其他地区。542年春天，君士坦丁堡开始流行瘟疫。死亡率起初不高，但在夏季来临时迅速升高到每天死亡大约一万人。挖坟坑不可能有这么快，所以只好把堡塔的顶掀掉，在塔里放满尸体再盖上顶。船上也装满死者，开到海上扔掉。

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正确使用“瘟疫”一词，因为这种病无疑就是腺鼠疫。患者突发高烧，头一两天内在腹股沟或腋窝出现典型的淋巴结腺状肿块。许多病人很快就陷入深度昏迷，其他病人则发展为高度的癫狂。他们看到幻影并听到预示死亡的声音。有时淋巴结溃烂为脓疮，病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死亡通常发生在得病的第五天，或许还会早些，但有时会拖延一两个星期。医生不能判断哪个病例的病情不重，哪个病例必然会死。因为不知道治疗方法，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到这场瘟疫结束时，40%的君士坦丁堡居民都死了。普罗科匹阿斯谈到引人注意的两点。第一，这场瘟疫总是先起于沿海地区，再传播到内陆。第二，与预料的情况不同，医生和照料病人、抬出死者的护理人员似乎并不比其他入更容易得病。

瘟疫不断地反复发作，大约一直延续到590年。它没有放过任何城镇或是村庄，即使是最偏远的居住区。假如有一个地区庆幸自己逃脱了，瘟疫肯定会在适当时间出现。西普里安瘟疫发病的程度有季节的高低，一般是在冬季到达高峰。查士丁尼瘟疫也有季节性的变化，在盛夏死人最多。许多城市和村庄被毁坏或是放弃，土地荒芜。恐慌使整个帝国陷入混乱。吉本记述道，各地农村从未恢复到以前的人口密度。普罗科匹阿斯从许多有关瘟疫的记录中注意到，在一次天灾爆发期间以及以后出现的墮落和淫乱中，只有最邪

恶的人活了下来。

传染病对罗马覆灭以及阻碍查士丁尼的事业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有待研究。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私，不加区别地折磨很有教养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城市居民要比农村人冒的风险大；遇到致命的传染病，一个紧密结合的组织要比一个松散的联合更快瓦解。最重要的是，生活舒适的人要比了解生活艰辛的人更有可能丧失勇气。因此，尽管瘟疫肯定严重影响了野蛮部落的战斗意志，但其对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在考虑帝国衰落过程中打击帝国的瘟疫的可怕后果时，可不必去注意导致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方面。

除了毁灭了罗马帝国以外，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个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尚未得到广泛认可。首先，假如罗马帝国不是在基督诞生后的一些年中受到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式。再者，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那么从4世纪到14世纪一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为了理解这些事，我们需要回溯到欧洲文明的开端，那时祭司和医生是同一个人。

在希腊传说中的早期岁月，阿波罗神杀死了一条毒蛇，蛇是疾病的一种象征。因为这一行动，阿波罗被看作是健康之神，但他同时也是瘟疫的传播者，用箭把疾病传给世人。所以人们必须不仅要崇拜他，也要安抚他。阿波罗把他有关治病能力的秘诀传给了半人半马的客戎(Chiron)，客戎又把这些知识教给了埃斯科拉庇俄斯。后者可能又与公元前1250年一个给人治病的人混淆不清，被尊为神在古希腊各地的庙中受到供奉。

对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崇拜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庙眠仪式(temple-sleep)病人给治疗之神献上祭品，并以沐浴来净身。然后他再在